

《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阶段性

未经许可
请勿引用

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

第十九集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史研究室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前 言

2013 年正值农村改革开放 35 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之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即将开启。回顾、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中国下一阶段的社会改革发展至关重要。为更好地让历史服务于现实，推动当代农史研究工作，我室继续加强共和国农业要事研究工作，继续征集和编撰《共和国农业史料征集与研究报告》。2013 年 7 月，我们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农村改革开放 35 周年座谈会”，与会的一些老同志和来自当代农史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提交了会议论文和其他回忆性文章。2013 年，依托有关任务和课题，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三农”思想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政策理论相关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特此一并奉上。敬请有关人士、有关部门、当事人和知情人提出宝贵建议，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史实线索，为当代农史研究工作提供更进一步的支持！也请文章撰写人和读者为我们积极指出编撰工作中的疏漏！

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您们在撰写、核校共和国农业史料方面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将永载史册！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史研究室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目 录

“纪念农村改革 35 周年座谈暨研讨会”综述……何安华、张静宜（1）

第一部分：农村改革开放 35 年三农政策理论创新

1、思想大解放，改革大发展

——纪念农村改革 35 周年……郭书田（13）

2、我国农村的历史性大变化 ……卢 文（21）

3、小康社会的中国梦，必将梦想成真

——为纪念农村改革开放 35 周年……林 干（29）

4、我国农村改革三十五周年

——农民热情拥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黄道霞（35）

5、市场化改革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于 1997-2010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葛继红（39）

6、从“引领改革”到“重中之重”

——中国农村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武 力（52）

7、新世纪十个中央一号文件：回顾与展望……孔祥智等（59）

8、“十六大”以来我国三农政策理论创新的必然性、主要成果

和基本经验……陈 洁（77）

9、新世纪以来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农业政策……何安华、孔祥智（92）

10、我国农业对外开放的发展形势

——纪念改革开放 35 周年……朱丕荣（105）

11、走出去办农业企业问题的探索……朱丕荣（117）

12、农村社会保障改革中的十大争论……张静宜（120）

13、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关注的九对伴生问题

……朱振亚、汪阳春（147）

- 14、湖北省农业农村发展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
.....当代农史研究室（159）
- 15、湖北省城乡统筹发展模式和经验.....当代农史研究室

第二部分：创新农业经营体制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 1、谈谈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适度规模经营
.....赵 明（206）
- 2、农村改革的焦点——土地问题
——重温杜润生同志关于土地问题的论述.....余 展（232）
- 3、关于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问题的一些看法.....吴天锡 237
- 4、改革以来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定位的历史考察
——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视角.....郑有贵（245）
- 5、“中国名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及实现形式.....王景新等（256）

第三部分：近代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毛泽东三农思想、小农经济及其他

- 1、新中国成立前的两次工业化成就.....冯开文（278）
- 2、农业集体化时代镌刻在历史名村的印记.....王景新（294）
- 3、毛泽东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思想研究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陈洁等（334）
- 4、当代中国环境变化与小农经济形态、作用变异.....董志凯（348）
- 5、关于农民理性的一点思考.....隋福民（358）
- 6、建国初期农业部机关工作与生活的回忆
——发扬统一战线、艰苦朴素、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朱丕荣（364）
- 7、我国农业利用国际粮食援助的来由、项目与成效.....朱丕荣（368）
- 8、2012 年农业大事记.....焦红坡（379）

“纪念农村改革 35 周年座谈暨研讨会”综述

何安华 张静宜

内容提要：2013 年 7 月 11 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纪念农村改革 35 周年座谈暨研讨会”。会议回顾了农村改革 35 年来农业农村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 35 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围绕农村改革的重要经验、重大政策理论突破和尚待解决的问题等进行了研讨，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2013 年 7 月 11 日，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纪念农村改革 35 周年座谈暨研讨会”。农业部长期从事“三农”工作和参与有关农村政策决策制定的部分离退休老领导和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科研单位从事农业经济与政策研究、经济史、当代农业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等共计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 20 多篇。会议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志喜主持，中心主任宋洪远出席会议并致辞。与会代表回顾了农村改革 35 年来农业农村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程，总结了我国农村改革 35 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主要围绕农村改革的重要经验、重大政策理论突破和尚待解决的问题等进行了研讨。兹将论文观点和座谈发言扼要综述如下。

一、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就和基本经验

（一）农村改革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以农村为突破口，农村改革带动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正如郭书田所说的“这是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1978 年以来，中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郭书田将中国 35 年的农村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至 2002 年党的十六大，第二阶段是由 2002 年党的十六大至党的十八大。第一阶段有五项重大改革成就：一是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使持续了 20 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体，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

进了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二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成为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三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采取村民自治方式，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四大民主”，开创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四是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大军涌现，突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壁垒；五是在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大幅增产的基础上，取消了“统购统销”制度，为建立农产品市场流通体制创造了物质条件。2002 年以来的改革，国家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通过推行税费改革、粮食四项补贴、农村社会保障等重大措施，逐步建立起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机制。回顾 35 年的农村改革，郭书田将其归纳为“四个大”：即思想的大解放，特别是搁置“姓社”和“姓资”的争论；旧体制的大解体，表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以及政社合一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大分化，如三大产业共同发展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第一产业总产值下降到 10%，农民家庭收入结构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各占一半左右；大发展，表现为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农村经济发展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8 元上升到 2012 的 7917 元。

林干认为，改革开放给“三农”发展增加了活力。如果没有农村改革，物质就会极度匮乏，贫困加重，人民也没办法自由发表意见。

黄道霞指出，中国农村改革最核心的成就是走成功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即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模式在各环节的表现是：在生产环节形成了地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既统一又分离的“双层经营”基本经营机制；交换环节完成了产品定价由改革前的“统购经销”计划价格变革为“双轨制”价格，最后实现了按市场供求规律调节的自由价格；流通环节出现了农村的资本、资金、劳动力的自由流通；分配环节破除了改革前的“大锅饭”分配，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实行多元化的分配方式，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消费环节实现了“三级跳”，即实现了解决“农民贫困”、“农民温饱”和农村基本实现“小康”。

卢文认为，1978 年后的农村改革是按农民意愿进行的，改革包括维持土地集体所有，建立有统有分的双层经营作为基本的经营制度；鼓励农户发展多种经

营，发展非农产业（主要是乡镇工业）；以集体经济为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经营方式；取消统购派购，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允许农民流动转移；让农民在发展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建设小城镇，改革隔离城乡的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发展外向型经济；实行多种分配制度；废除人民公社，恢复乡政权，大队改为行政村等。通过农村改革，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多头发展生产，使农村出现蓬勃发展和欣欣向荣的局面。

武力认为，中国农村改革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引领改革”转向新世纪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过程，改革成效巨大，使中国不仅完全解决了“吃饭”问题，还跨越了“温饱”阶段，正向“全面小康”挺进。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到“反哺”的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 1978 年的 17.9% 提高到 2012 年的 52.56%。国家综合国力大为提高。

朱丕荣对我国农业对外开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他提到，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方针指导下，我国农业对外交往与合作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在农业国际舞台上更为活跃。双边关系由过去与 50 多个国家有往来扩大到现在的 150 多个国家，同时我国还参加了许多国际机构的合作与活动。他还回顾了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计划委员会两届委员的工作经历，认为党和国家对外开放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今后应当扩大中国对外影响。

（二）农村改革的基本经验

农村改革 35 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村经济日益繁荣，农民生活不断改善，这一系列的重要成就与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三农”工作经验密不可分。回顾 35 年的农村改革历程，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与会者对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历史经验进行了概括。

郭书田认为，1978—2002 年的农村改革，大体经历了“解放思想——群众创造——专家总结——领导认可——政府规范”的过程，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经验是解放思想，勇于突破理论观念的“禁区”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尊重并积极支持农民的意愿与选择以及首创精神；循序渐进推行改革，不搞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同时还要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他认为这一阶段的改革成就和中央政策反映在 1982—1986 年的 5 个中央一号文件之中，并称

这 5 个中央一号文件是第一阶段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2002 年以后的农村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推进的，集中反映在 2004—2012 年的 9 个中央 1 号文件中，中央 1 号文件是这一阶段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

黄道霞指出，35 年的农村改革激发了农民发挥“热情拥抱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性。在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方面，改革激发了农民发挥增加农产品商品生产的积极性，由此基本上改变了改革前农产品计划供应严重补缺的状况；激发了农民发挥开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促进农村非农商品大发展，使许多农村“先富起来”；激发了农民发挥探索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民发挥“走出去”、参与全球化、国际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大量涌现跨国经营农民企业家和外向型农业企业。农村建设方面，改革激发了农民发挥发展农村文化、参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完善农村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的积极性，使新农村建设在农民的热情参与中稳步推进。

武力认为，凡是关于“三农”问题正确认识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基础上的。照搬马克思主义某些设想、苏联社会主义理论模式或凭主观愿望会造成认识上的失误。正确的认识和方针政策来自良好的民主集中制，而错误的认识多产生于独断专行或压制不同意见。凡是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就是正确的。他进一步指出，一切认识和决策的前提应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或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去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

二、农村改革中的制度创新与完善

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调整不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我国 35 年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也是继续推进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则。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就要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形势中创新和完善农村的经济体制机制。

（一）重新认识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作用

创新农业生产经营制度，集体经济要发挥更大作用。吴天锡认为，农村改革的实质内容，可以由十三届八中全会提出的四句话来概括，即“继续稳定以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

系，逐步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这应是我们今后改革的重点方向，也是“创新”的出发点。他还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加强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工作，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作用，同时还要不断完善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工作，提倡“一业为主、综合经营”。

郑有贵提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应当将增强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服务能力作为重要的内容。坚持宜统则统和宜分则分原则，在完善双层经营体制过程中强调把集体经济组织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对农户的服务上，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承担日益增多的基本公共服务，推进农业服务社会化进程。

赵明针对当前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些错误认识和实践，指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所讲“统一经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一个经营层次的职能，而不是“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所能代替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龙头企业和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都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公平交易和互利互惠的关系。后者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向前者搞什么“统一经营”，它只有提供优质服务的义务。如果让后者在前者中搞“统一经营”，那就剥夺了前者的权力，必然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它实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起消亡。因此，要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工作，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功能，科学发展集体经济和适度的规模经营。

对于集体经济的发展，王景新认为集体经济对生产责任制度有严重依赖；集体经济组织一旦形成，必然呼唤建立生产责任制度。只要顺应这一趋势，把集体生产责任制度和个体承包责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就能保证集体经济效率。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度是农业生产中最有效的责任制度；家庭承包经营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个经营层次，而不是像某些人所指责的“变相私有化”。集体生产中建立有效的责任制度，既是中国农业集体化时代（三年自然灾害除外）主要农产品产量始终保持增长趋势和当今中国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原因和重要保障，也是最具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此外，王景新基于对“中国名村”的调查，梳理了“中国名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脉络，总结了集体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实现形式。他指出，中国当今“明星村”中，工业型村域经济类型占绝大多数，依靠农业经济而发展为著名经济强村的为零。仅仅依靠农业现代化是否能够将村域经济带入富裕村行列特别需要研究。另外，历史

名村和当今“明星村”无一例外地把旅游业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产业。王景新的研究对中国集体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

（二）新形势下重新审视小农经济理性

董志凯认为，当代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小农经济的形态和作用，表现在土地流转促进了经营规模的变化，农业产业化促进了经营方式的转变，信息化发展促进了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化，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降低了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虽然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要求发展多种生产经营形式，但是近 90% 的耕地由农户家庭承包经营，且农户家庭生产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 80%，因此，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这一点不能动摇。今后相当时期内，小农仍是主要经营主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重新认识农村价值、小农经济形态与农户家庭经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正确引导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发展势态以及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

隋福民认为应从农民的理性角度去看待“三农”问题和小农经济问题，农民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主体，但其掌握的信息和资本数量有限，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应当正确看待农民的理性，相信农民的理性，鼓励农民的有益创造，给予农民应有的权利，壮大农民的力量。

（三）城乡一体化的探讨与地方实践

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是促进城乡一体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张静宜针对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方向、措施和重点，围绕着“要不要建，怎么建，关系如何协调，问题如何解决”等核心问题概括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十大争论。她认为，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切忌迷信市场或简单把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推向个人和集体；要坚持公平取向，切忌为追求效率而牺牲公平；必须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切忌政策随意、工作草率。

朱振亚和汪阳春探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九对伴生问题，即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小农耕作与规模经营、土地长期承包与短期流转、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生态环境退化、青壮年进城打工与老妇幼农村留守、新市民的城市向往与现实羁绊、农民工进城务工与返乡创业、农村人才流失与大学生村官进村入驻、农村传统主业走低与新型主业兴起。他们指出上述九对伴生问题需要进行学理思辨。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史研究室基于对湖北省统筹城乡发展调查，总结了湖北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和经验。认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坚持“市场主导、农民主体”的原则，促进人口城市化发展；以新型城镇化引领“四化”协调科学发展，努力形成中心镇、小集镇、中心村（农村新社区）多层次互动、全域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新格局。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规划要先行，要制定产业支撑计划，还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进行体制机制创新。

三、新世纪“三农”政策的理论创新

与会者提交了数篇关于新世纪“三农”政策理论的研究论文，对新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三农”政策的框架、政策出台背景、理论突破等问题做了深刻剖析。

（一）新世纪“三农”政策出台的背景或必然性

孔祥智等指出，1997—2003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实际年均增长仅 4%，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年均增长 8.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受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等因素影响，从 1998 年起，全国粮食的播种面积、总产和单产连年下滑。农业基础日益脆弱，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加入 WTO 以后，国内农产品宏观调控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受外资控制风险增加，农业产业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农业生产方面，生产成本自 1990 年以来持续走高，农产品价格呈波动性上涨趋势。综合上述农业农村新特征，孔祥智等认为，如不妥善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在新世纪连续出台了 10 个旨在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框架。

陈洁分析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政策框架形成的必然性。她认为新时期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的不断完善，从根本上讲是城乡需要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规律性所决定的。城乡协同发展的规律性决定了国家必须给予农业农村发展应有的支持。世纪之交，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例如粮食生产大滑坡，内需不足特别是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衔接机制尚未建立等，多重挑战使农业农村发展成为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另外，我国经济发

展水平快速提高、国库不断充盈，国家财力增加为连续密集出台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提供了前提条件。

何安华等分析了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背景，认为工农劳动生产比率在逐渐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再次扩大且日趋严重，城乡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差距扩大化问题严重，使得城乡矛盾日益凸显。同时，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城乡统筹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已然具备。因此，国家适时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二）新世纪“三农”政策的侧重点和成效

孔祥智等指出，新世纪以来的 10 个中央一号文件在指导思想和内容安排上都一脉相承。他们对 10 个中央一号文件进行了归纳，总结出八个政策关注重点，分别是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建立财政支农长效机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和社会化服务、培育新型农民与提高组织化程度以及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粮食产量实现了“九连增”，其他重要农产品全面发展。农民收入实现了“九连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初步呈现缩小态势。农村公共事业全面发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加速均等化。初步建立起财政支农机制，支农投入持续大幅增加。农业对外开放度大幅提升，初步形成了开放条件下的市场调控机制。

陈洁把新世纪“三农”政策理论创新的主要成果概括为“三个明确”，即明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略、明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明确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她进一步总结了“三农”政策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凝练出“五个坚持”，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和坚持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

何安华等认为理解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深化须把握两个方向，一是统筹的深度在加深，主要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在增强，具体表现为生产补贴、税费改革、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财政投入在总量上逐年增加，在比例上有所提高。二是统筹的广度在延伸，覆盖范围从城乡经济扩展到城乡文化、城乡政治和城乡社会事业的各个方面，从生产领域延伸到生活领域，从人居环境

建设扩大到生态环境建设，体现了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社会性和系统性的民生工程。

四、农村改革仍面临的难题和建议

（一）农村改革面临的几个难题

与会者充分肯定了我国农村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一致认为，推进农村改革还有许多难题要解决。他们不禁感慨，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依旧任重道远。

一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约束在增强。郭书田认为，农业现代化未能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而且农业副业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农村只剩下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三大群体。耕地资源也在日益减少，1995年以来，耕地面积已由19.5亿亩减至18.3亿亩，净减1.2亿亩。林干指出，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矛盾加剧，农村资源要素流失加快，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户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将来“谁来种地”的问题须提前想好对策。吴天锡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高潮阶段，而城镇化又要求农业提供足够的产品，但当前我国水土资源比较紧缺，农村劳力较为薄弱，这无疑加大了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难度。

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加大。武力提出，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强调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因素，大量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所受到的制约将会增大，未来通过“城乡一体化”去解决“三农”问题的困难也会增加。

三是农民工和市民的权益均等问题。郭书田指出，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以及户籍身份等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甚大。武力认为，农民进入城市居住、就业和充分享受市民待遇，实现城乡之间改革产品的均等化，都将成为“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的突出问题。

四是乡村环境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徐旺生认为未来农村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乡村环境保护，因为乡村环境关系到子孙发展，但在中央所有的文件中都没有从实的方面有所体现。他坦言，如果中央的政策文件不重视这个问题，解决其他问题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郭书田指出，农村生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粮食的“九连增”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生态环境

为代价的。卢文对郭书田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也指出，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耕地减少，森林过度砍伐，土地、空气和水资源污染范围大，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荒漠化、草原退化、食物污染增加等问题严重。为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国家应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教育农民具有生态文明意识，继续植树造林，美化环境，防止和治理污染，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产业。

此外，郭书田还提到了地方政府征地时“低进高出”，从中获取高额差价收益，甚至出现强制拆迁现象，侵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使农民成为无地、无就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群，加剧农民的不满情绪。林干提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黄道霞认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期，核心是扩大内需，以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发展，但农民的消费不足，如何将农村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二）深化农村改革的建议

与会者情系“三农”，就如何推进农村改革、尽快解决阻碍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回首过往，35年的农村改革已成历史。展望未来，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党和政府依旧任务艰巨。

郭书田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而希望也在农村，出路在于深化改革。要以村为基点，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尊重和支持农民的首创精神，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就能增加正能量，国家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林干认为，只要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三农”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好。

黄道霞指出，扩大农村消费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农村干部要树立新的群众观念，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允许农民群众结合农村实际需求和消费谋发展。同时还要大胆创办适应农村实际需求和消费的实体企业，将需求和消费与发展对接

起来。

朱丕荣着眼于农业对外开放问题，认为农业对外开放面临更加复杂繁重的任务，在新形势下，国家和地方农业部门需加强对农业外事工作的领导，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加强调查研究，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农业“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和支持政策，争取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方面优惠扶持。同时还要充实和扩大农业外事队伍建设。

卢文认为，在今后的二、三十年中，我国农村要实现深刻的历史性巨大变化，需要深入做好多方面的工作，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要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残余和消极影响，使农民工和市民真正享有同等待遇。引导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用合作与联合的多种形式扩大经营规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村民主改革，努力发展农村科教事业，强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

陈洁认为，农村改革能否成功推进，农村发展活力能否得到充分释放，从根本讲取决于能否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权益，在政治上保护农民的权利。

孔祥智等基于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特征和战略任务，认为中国未来的农业政策将着力于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以及在促进“四化同步”前提下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五、研讨交流的其他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余展总结了“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同志关于土地问题的核心认识。杜润生强调了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的联系，必须慎重对待农民的土地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打破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引导农民合作和社会化服务发展；搞活市场，在强调土地承包权稳定的同时，要多措并举促进土地要素流动，优化配置资源。

陈洁等总结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重要思想，并研究了在其思想的引导下我国农业农村取得的巨大成就。毛泽东强调农业是基础，重视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合作化。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在革命和建设充分相信和依靠农民的力量。积极推进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毛泽东的“三农”思想作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重要思想遗产，今后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朱丕荣撰文回忆了建国初期农业部机关的工作与生活。在机关干部队伍建设过程中，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在实际工作中，保持艰苦朴素，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冯开文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两次工业化成就，即晚清洋务运动和民国工商业发展实践。这两次工业化尝试不仅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改变了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也开放了思想，革新了观念，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阶段。

六、结语

此次研讨会中，与会者畅所欲言，就实避虚，提交的论文或发言都是基于自己长期坚持的实地调查、用心观察或事实材料，避免空洞无物之谈。与会者“写实”、“言实”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了学者对“三农”的深情、对改革的期盼和对国家建设的热心。农村改革 35 年来，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都得益于党的政策坚持从国情和民情出发，实事求是，贯彻执行得力。在看到农村改革所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适时总结农村改革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更加明确当前阻碍农村深入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集中研究力量和政策力量解决之。为此，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望得以彻底解决。

第一部分：农村改革开放 35 年三农政策理论创新

思想大解放，改革大发展

——纪念农村改革 35 周年

郭书田

中国的改革是以农村为突破口，取得成效从而带动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多年以来，经历了两次农村包围城市，第一次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农村为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第二次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以农村为突破口，推行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胜利，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胜利。

（一）

35 年以来，农村改革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至 2002 年党的十六大。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方针指引下，解放思想，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亿万农民自下而上的奋起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一是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也就是土地经营的包干到户），成为市场经济的“细胞”，从不许和不要包产到户到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从 15 年不变到 30 年不变直到永远不变和长久不变，使持续了 20 年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体，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正如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著名人力资本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说，这是中国农村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二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成为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正如一位外国政要说，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武器”。三是民主